

食物体制理论的演进及其中国意义^{*}

——一个农业社会学的视角

熊春文 柯雪龙 李梦琪

提要:作为农业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流派,食物体制理论揭示了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在贸易纠纷、政治斗争和地缘冲突不断的当下,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农业和食物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了食物体制理论的渊源、内容及演进,讨论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可能。食物体制理论有助于认识现代农业体系的构成,对发展中国海外农业体系、探索“大国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以及完善中国内部粮食体系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该理论与中国经验的结合呼应了国际食物体制理论的最新研究动向,也是发展扎根本土的中国农业社会学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食物体制 食品安全 全球化 农业社会学

一、引言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班固,2005)。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业和食物的政治性,将食品安全视作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作为农业和食物关系现代化的标志,食物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断分离形成了横跨全球的复杂农业和食物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囊括人、组织、国家、法律规则、生态系统及价值系统等诸多因素,更隐匿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机制(Whatmore,1995)。揭示隐匿于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的复杂关系和机制,将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的“不可见”呈现出来,是全球化背景下农业社会学的重要使命。为了回应这一使命,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农业社会学中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小农户生产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机制研究”(23ASH0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文章修改提供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为基础的针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研究。在这一波研究浪潮中,涌现出了食物体制(food regime)、全球农业食品商品链(global agri-food commodity chains)、农业—食物政治社会学的新规制主义(agri-food political-sociological neo-regulationist)等重要理论流派(Buttel,2001:172)。

在这些流派之中,食物体制理论凭借其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政治经济利益关系的深刻阐释,成为社会学研究农业和食物现象经久不衰的理论工具。2000—2024年,国际知名社会学期刊《农业与人类价值》(*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和《农村社会学》(*Sociologia Ruralis*)共刊发了39篇以“食物体制”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两刊间接涉及和引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作为从农业社会学中生发的理论概念,食物体制理论获得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远超社会学学科范畴,成为当下全球农业和食物研究领域跨学科交流融合最重要的媒介理论之一。2000—2024年,以“食物体制”为主题刊发的国际学术文章多达406篇,涉及发展研究、环境科学、农业科学、食品科学、地理科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①这一方面与该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完善自身理论框架的包容性和拓展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食物主权概念广泛传播所推动的国际农业和食物研究转向有着密切联系。随着21世纪以来多次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和以“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为代表的食物主权运动的兴起,国际学界对资本主义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批判与对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探索赋予了食物体制理论新的理论使命和时代意义。这一理论流派不仅是当下国际农业和食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在农业和食物研究领域开展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媒介理论。

遗憾的是,尽管以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并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大食物观”的确立推动了国内粮食安全研究向食物安全研究的转向,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食物主权等国际农业与食物研究热点议题(周立等,2022;方平等,2023),但是学界对于食物体制理论及其所涉及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仍缺乏充分的讨论。部分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重要性,从而在对西方社会学农业和食物研究历程的梳理以及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弊端的分析中简要提及了食物体制理论(李静松,2019,2020;许准,2024)。然而,这种讨论对于揭示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的复杂权力利益关系以及推动中国农业与食物研究同国际接轨仍是严重不足的。基于此,本文计划从研究背景、核心概

^①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关键词如下:主题为“food regimes”,研究方向分别为“sociology”及“all”,出版年为“2000—2024”,检索时间为2024年10月29日。

念和分析框架入手,对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经典食物体制理论进行扼要梳理。在追踪该理论在当代的关键转向、核心争论和前沿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讨论将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意义、议题和挑战。基于中国情境开展食物体制研究,既是农业和食物体系全球化趋势下保障中国食物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农业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二、跨越农场和国家的边界: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轮廓

(一)反思与超越: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背景

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最初是为了探索“农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及国家体系发展中的作用”(Friedmann & McMichael, 1989:93)。这一理论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延伸与发展(Bernstein, 2016:623),又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农业社会学的农业研究范式变革息息相关(Buttel, 2001:168)。

“二战”结束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在前殖民地国家应用遭遇普遍失败,这引发了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强调的民族国家内部工业和农业的互补性只在英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得以体现,而欠发达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体系早在殖民时期便因殖民干预形成了严重的出口依赖(Amin, 1974)。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的资本和势力对这些国家内部的国民经济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一个覆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然形成(沃勒斯坦, 2013)。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再只依靠民族国家内部城乡或工农之间的互动实现,而是依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尺度下进行。因此,研究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和改造以及农业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都不能再局限于城乡差异、阶层结构、农业技术等民族国家内部的因素,而需要将跨国资本借由世界体系所施加的外部干预和影响考虑在内。食物体制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问题意识,并在全球尺度下展开对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迈克尔指出“食物体制理论并不是关于食物本身的理论,而是研究食物生产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这种关系被生产和复制的”(McMichael, 2009:140)。

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还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有着更为直接的经验现实背景,并与西方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变革相关联。在食物体制理论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农业和食物体系正在经历着“去民族国家化”的浪潮。跨国农业公司逐渐成了农业投资、种植和经营的主导者,以跨国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商品链已然形成,食物的生产正在以种类为单位逐渐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彼时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仍局限于农业生产端的研究,无法为理解现实变化提供足够的帮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农业生产只是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一环,只关注生产环节的传统农业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农业快速全球化的新特征。这些研究者指出,必须超越传统的农业生产分析尺度,关注“农场大门”之外的动态、过程和实践,对农业供应链和消费端相关的内容展开研究(Buttel, 2001: 175)。正是变化的经验现实以及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呼声催生了以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为研究对象的食物体制理论。

(二) 规则与体系: 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

为了更好地呈现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全球食物体系来实现资本积累与再生产,食物体制理论借鉴了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的调节理论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以“规则”和“体系”为核心概念勾勒出食物体制的基本轮廓。

阿格列塔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模式称为积累体制,它涵盖了技术、劳动组织方式、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生产体制运行的基本经济条件。资本主义必须不断调节其制度形式以保障积累体制顺利运行,这种包含规则、惯例、组织形态和制度等复杂因素的调节的集合,即是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Aglietta, 1979)。弗里德曼将食物体制解释为“世界范围内受规则支配的食物生产和消费结构”(Friedmann, 1995: 513),这里的“规则”就是阿格列塔强调的资本主义调节模式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体现。这种“规则”在食物体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修饰其所形塑的不平等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争取公众认同以获取制度合法性。例如,第一个食物体制实质上是英国殖民霸权为掠夺殖民地/移民国家的廉价食物而形塑的,但这种掠夺为“自由贸易”的“规则”所修饰,这种修饰形成的大众认同赋予了其制度合法性。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改变,支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规则”也会发生改变,进而推动新的食物体制形成。通过对“规则”概念的使用,食物体制理论将全球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回答了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这一核心问题。

沃勒斯坦认为,种族、民族或是国家始终是以某种形式联系在一起而非孤立发展的,因而总是会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则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呈现“世界经济体”的形态。世界经济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但也同时被文化联系或政治安排加强。世界经济体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实现资本积累这一主要目的,推动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国家体系结构。这种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和国家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居于核心位置的国家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会不断通过体系对处于半边缘和边缘位置的国家进行剥削(沃勒斯坦,2013)。食物体制理论借鉴了世界体系论的这一判断,并认为特定时期的全球食物体系是该时期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国家体系结构在农业和食物领域的投射,其外在形态即是农业和食物领域的国际分工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强调“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谨慎地不把农业和食物体系与普遍存在的国家农业政策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开”(Friedmann & McMichael,1989:95)。

(三) 稳定与变革: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基于“规则”和“体系”两个核心概念,食物体制理论强调特定时期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需要和国际霸权秩序形塑了某种“食物体制”,这一食物体制以相对固定的规则支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并推动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国际分工体系的出现。而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改变,国际霸权秩序也将重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便会进入动荡的变革时期。旧食物体制的规则逐渐丧失合法性,其所组织的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崩塌。而孕育于旧食物体制之中的新要素则会逐步发展壮大,在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体制推动形成的新食物体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稳定—变革的研究视角正是食物体制理论区别于其他食物体系研究的本质不同。基于这一研究视角,食物体制理论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食物体系变迁展开了分析。

资本主义积累体制需要的变迁与国际霸权秩序的重组是食物体制形成和消亡的根本原因。第一个食物体制(1870—1914年)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外延性资本积累”体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需求推动的。而第一个食物体制之所以会向第二个食物体制(1947—1973年)转变,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向依靠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品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内涵型资本积累”阶段的转变(李其庆,2004)。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迁也往往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组

和国际霸权的转移。英国凭借其庞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在“外延性资本积累”阶段成为世界秩序中心的霸权国家,进而主导了第一个食物体制(Friedmann, 2005:234)。而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进入“内涵型资本积累”阶段后取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从而主导了第二个食物体制(Friedmann, 2005:240)。

规则的合法性和体系的持续性是食物体制形成和消亡的核心动力。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需要并维系国际霸权秩序,霸权国家必须形塑一个以隐性规则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国际农业和食物分工体系,以实现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控制和主导。英国主导的第一个食物体制以“自由贸易”为“规则”,形塑了一个由欧洲工人阶层消费群体与殖民地/移民国家廉价农产品组成的“殖民—离散食物体制”(the colonial-diasporic food regime)。而随着20世纪初英国殖民霸权的没落、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新大陆自然生态灾害对“自由贸易”规则的冲击,欧洲—殖民地/移民国家的分工体系也难以维系,第一个食物体制逐步走向解体(Friedmann, 2005:235)。尽管第一个食物体制走向了消亡,但其所形塑的以出口为生产导向的家庭农场主阶层却在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壮大,成为以“发展援助”为规则、由美国主导的“重商—工业食物体制”(the mercantile-industrial food regime)中的主要农业生产经营群体。从“自由贸易”向“发展援助”的规则转变使得第二个食物体制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比第一个食物体制更隐晦而难以察觉。但这一食物体制仍建立在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的基础上,因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粮食危机、经济危机和贸易争端的冲击以及国际秩序多极化趋势的加强,“发展援助”的规则日益遭受质疑,美国/欧洲—第三世界国家的食物生产消费分工体系亦难以维系,第二个食物体制因此走向了消亡(Friedmann, 2005)。

(四) 固化与缺失: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主要局限

通过将现代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发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经典食物体制理论揭示了隐匿于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但这种揭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遭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食物体制理论从政治历史层面出色地描绘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的发展变化,但这种描述却与调节理论的分析范式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该理论对全球食物体系历史阶段的分析过于模糊且充满矛盾(Araghi, 200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典食物体制理论蕴含的中心—边缘二元

对立的分析范式是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复杂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过度简化。对资本渗透和改造农业的过度强调使得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对资本与农业具体关系的讨论脱离现实,变成了一种同质化的宏大叙事理论(Goodman & Watts, 1994; Bernstein, 2016; Marsden, 2016)。这些批评揭示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局限和不足,进而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当代发展。

三、回归农业与资本的复杂关系： 食物体制理论的当代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对当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讨论。然而,摆在学者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现象的复杂农业和食物体系。一方面,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进一步公司化和资本化。跨国农业公司主导了全球农产品贸易链条,并依托现代食品工业技术生产和销售着消费者难以追溯产地、无法判断成分的廉价工业食品,即“不知来自何处的食物”(food from nowhere)(Campbell, 2009:311)。另一方面,反对跨国农业公司主导的廉价工业食品体系的社会运动也在全球各地兴起,这些绿色环保运动迫使跨国农业公司同时建立起一个符合消费者对环境保护和健康饮食的诉求、与廉价工业食品体系平行的绿色食物体系,向食物消费者提供能够被追踪来源且符合特定绿色健康标准的“来自某处的食物”(food from somewhere)(Friedmann, 2005:246)。

如何理解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同时存在于当前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跨国农业公司是否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主导者?绿色环保主义的兴起对当下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当下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食物体制?发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经典食物体制理论难以全面回答这些问题,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宏观经济结构因素之下更为具体和多元的因素,由此推动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转向和生态转向。在此基础上,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者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的形态以及食物体制理论的命运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研究从范式化的宏观政治经济叙事中抽离出来,重新回到对农业与资本复杂关系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和讨论中。

(一)动力与断裂: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转向与生态转向

绿色环保运动对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影响使得食物体制研究者开始重视社

会运动和文化合法性在食物体制变迁中的作用,并重新审视了食物体制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食物体制消亡的导火索是欧洲失地农民发起的农业保护主义运动对“自由贸易”规则的冲击,这些运动推动了农业重商主义在第二个食物体制时期的兴盛。而反全球化运动导致公众对“发展援助”的认识向“产品倾销”转变,这使得第二个食物体制的制度和合法性逐渐崩塌,并推动了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公司化和资本化浪潮(Friedmann, 2005; Campbell, 2009)。食物体制研究者们逐渐形成共识,即此起彼伏的绿色环保运动是否会冲击并消解跨国农业公司的制度和合法性将是决定第三个食物体制样态的关键因素,因而必须厘清绿色环保运动的根本成因。这一共识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转向朝着生态方向延伸。

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很早就关注到食物体制所导致的生态灾害,并将其视作食物体制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随着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变迁的核心问题,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者尝试引入政治生态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生态转向。“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sm rift)^①概念的引入揭示了资本主义割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循环、引发生态灾难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了旧食物体制的消亡是其形塑的食物体系在文化和生态层面的双重溃败所致(Campbell, 2009: 316)。而“生态反馈”(ecological feedback)概念的引入则解释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不断拉长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物理距离来削弱消费者对于食物体制生态灾难的感受,致使整个食物体系难以对生态灾害做出及时反馈,正如19世纪肆虐美国的“黑尘暴”难以被远在欧洲的美国廉价小麦消费群体感知。然而,随着气候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等跨越物理距离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资本主义导致的生态问题日益被消费者群体所感知,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掩盖食物体制造成的生态灾难,公众对于生态灾难的感知最终导致了愈演愈烈的绿色环保主义运动(Campbell, 2009: 317)。

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文化生态转向使得食物体制研究摆脱了过度聚焦宏观现象的局限,转而关注农业和食物体系更为微观具体的动态。而对于资本主义农业和食物体系生态灾难性后果的关注则使得食物体制研究开始将人类命运

① “新陈代谢”一词在德语中为 *stoffwechsel*, 在英语中为 *metabolism*。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分别被译为“新陈代谢”和“物质交换”。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的中译本中则统一译为“新陈代谢”。本文采用后者的译法将“metabolism rift”统一译为“新陈代谢断裂”。

与农业未来这些拥有更为广阔问题域的议题纳入食物体制研究的讨论中,主导了现代食物体制理论走向的争论。

(二) 分歧与争论:第三个食物体制与食物体制理论的命运

在向文化和生态领域延伸的过程中,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者对于当下是否已经形成了第三个食物体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麦克迈克尔旗帜鲜明地表示新的食物体制——公司食物体制(corporate food regime)已经诞生,其最大的特点是跨国农业公司对全球食物体系的掌控(McMichael,2009)。跨国农业公司通过广泛的圈地运动使农民不断脱离农业生产,并将人类引向气候灾难、物种灭绝、金融混乱和大规模饥荒。尽管跨国农业公司被迫形塑了一套环境友好和符合健康饮食诉求的平行食物体系,但这也不过是跨国农业公司的“绿色洗白”(greenwashing)。麦克迈克尔因而呼吁,食物体制研究应与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运动相结合,为抵制跨国农业公司垄断并赋予农民更多主权发声,共同推动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性食物体系(McMichael,2014)。

然而,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基于如下三点理由驳斥了麦克迈克尔的公司食物体制理论及其替代性食物体系主张(Bernstein,2016:641-643)。第一,并不存在绝对二元对立的跨国农业公司和农民群体,资本主义不仅通过自上而下的圈地运动和剥夺性积累实现对农业的渗透和控制,也通过自下而上的推动农民群体内部分化在农业扩大再生产中发挥作用。第二,并不存在完全脱离资本主义食物体系的农民群体,即使是麦克迈克尔所寄予期望的本地化生产的小农群体,在试图摆脱边缘地位、融入更大的商品市场时便已经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第三,传统农业和生态农业难以承担养活全球人口的重任,脱离资本主义回到传统和地方化模式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食物体系的有效替代。基于以上三点,伯恩斯坦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渗透和控制农业的方式与程度存在差异,但资本逐渐支配农业、重塑农业并最终将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总趋势并不会改变;当前食物体制理论研究应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控制如何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食物生产、资源分配以及社会不平等,而不是简单地回归“去资本化”或“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化设想。

弗里德曼将二者的争论与食物体制理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认为无论是麦克迈克尔的主张还是伯恩斯坦的判断,都在暗示食物体制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Friedmann,2016:672,675-676,681,685)。在她看来,倘若资本主义食物体系到了必须被替代或最终导致人类灭亡的阶段,又怎么可能有新的食物体制可

供研究;而倘若农业已经被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生产部门,失去特殊性的农业又有何必要被单独讨论(Friedmann,2016:673)。弗里德曼因而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极强的适应性和调节能力使得其一定程度上修复和遏制“新陈代谢断裂”,从而避免陷入不可回旋的生态危机。“来自某处的食物”并非只是跨国农业公司的“绿色洗白”,而是预示着一种兼具跨国农业公司特征和绿色环保特点的公司—环境食物体制(corporate-environmental food regime)出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农业并非只有被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单向命运。除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食物体系,未来依然可能会看到更可持续、生态环保的非资本主义农业的出现。这种农业并不是建立在回归传统农业模式和地方农业知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新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以及获得更多主动权的农民群体基础之上。

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的这场争论使得众多食物体制研究者意识到,宏观导向的食物体制理论研究难以识别资本主义内部的复杂派别及其内在矛盾,必须构建包含区域、国家等多元分析单元,关注所有阶层而不仅是农民阶层,同时具备中介理论、复杂方法、超越世界体系层面的食物体制分析(Otero,2016:303)。在这一共识下,新时期食物体制研究逐渐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和新议题,推动食物体制理论研究回归对农业和资本复杂关系的讨论。

(三)回归与突破: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新趋势与新议题

1. 反范式与国家研究的回归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分析范式的反思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研究的再国家化和去中心化。尽管部分学者强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去调节和私有化的新阶段,国家在新的食物体制中已经沦为服务跨国资本需求的从属角色(McMichael,2021),但另一些学者指出,哪怕是在公司食物体制下,跨国农业公司仍需依赖由国家制定的各项贸易政策(尤其是农业贸易政策)组成的“新规制模式”(neoregulation)来改变市场规则,以实现自身的扩张和发展(Pechlaner & Otero,2008)。国家并没有丧失对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影响,而是通过更加多样化的形式来调节和控制着农业和食物体系,这种形式的具体样态取决于跨国(全球)力量、国家内部力量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Werner,2021)。因此,必须重新重视和讨论国家在当下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作用,推动食物体制理论研究的再国家化。在此基础上,随着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世界体系多极化趋势的加强,部分学者认为当下并不存在一个像过去那样

由单一霸权国家主导的食物体制,而是正处在向多极化食物体制发展的过程中。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长期被经典食物体制所忽视的金砖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理应成为当下食物体制理论考察的重心(Escher, 2021)。基于此,众多学者对全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食物体制展开研究和讨论,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国家研究的去中心化(Otero et al., 2013; Brown, 2020)。其中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对中国在全球食物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的关注和讨论(McMichael, 2020; Green, 2022)。这些研究既反映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所处位置和扮演角色的认识,也影响着中国在国际食物和农业领域的声誉和形象。

2. 空间性与多尺度研究的建构

资本主义与农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关系的复杂性是伯恩斯坦和弗里德曼批评公司食物体制理论的核心依据之一,因而也成为新时期食物体制理论学者关注的重点。为了揭示和讨论资本主义与农业关系的这种空间复杂性,新时期的食物体制研究积极尝试应用新的研究方法来还原不同空间维度下农业与资本主义多样化的互动过程。伯恩斯坦就强调应该将农业内部、民族国家内部经济和世界经济对于食物体制的影响都纳入食物体制研究范畴,从而将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的要素结合起来(Bernstein, 2016)。一些学者则认为可以借鉴应用地理学中“空间拓扑”(spatial topology)的概念将任何食物体制讨论置于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地方的空间分析中,以突出“食物体制理论跨越空间的力量”(Wang, 2018: 748)。也有部分学者强调应该尝试与地理政治经济学(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合作,这是因为该学科在考察全球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空间多样性”上颇有建树(Jakobsen, 2021)。总的来说,最新的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越发关注不同空间维度下资本主义与农业关系的复杂样态,以及这种复杂性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影响,从而尝试形成兼具历史性与空间性的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范式。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不仅将食物体制理论的应用从全球范围聚焦至更小尺度的区域研究,也为克服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处理资本主义—农业关系的简单化、同质化局限做出了贡献。

3. 社会运动与文化维度的拓展

早在21世纪初,食物体制研究就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在食物体制中的作用。但正如部分学者批评的那样,这种关注仍停留在对食物体制中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和作用的抽象讨论上,却疏于考察不同时空维度下社会文化因素与资本主义

在食物体制中更为具体的互动过程(Otero, 2016: 302)。因此,新时期的食物体制研究高度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阶层群体及文化观念在食物体制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学者们细致地考察了西班牙丰富的农业类型所形塑的不同农民职业群体如何在食物体制下影响西班牙食物体系的变迁(Ríos-Núñez & Coq-Huelva, 2015);殖民时期的美国如何通过菲律宾农业工人阶层的无偿劳动来实现对廉价热带经济作物的攫取(Camba, 2018);埃及国内金融资本家阶层如何与国际资本“里应外合”推动埃及农业的金融化和公司化(Dixon, 2014);以及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的扩散如何导致本国中小规模农业的大面积消亡,并催生基于大规模土地租赁的新农业阶层(Torrado, 2016)。这些研究填补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关系复杂性考察的缺失,深化了食物体制理论对于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认为已有的食物体制研究过于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在反抗食物体制中的作用,却疏于考察顺从食物体制的文化和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使得该理论对食物体制霸权形成和运作过程的认识严重不足(Brown, 2020)。基于此,一批食物体制研究者考察了国际霸权如何借助社会阶层和文化观念形塑对食物体制的普遍认同。例如,英国巧妙地利用印度种姓制度文化来分化印度农民群体,以维护其殖民食物体制的稳定(Brown, 2020);危地马拉棕榈油农业扩张的背后是跨国资本对于危地马拉种族矛盾的利用(Pietilainen & Otero, 2019);跨国农业公司通过改变北美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农业与食物的价值认知,成功掩盖了资本主义农业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Plank et al., 2020)。

4. 雇工化与劳动研究的延伸

随着全球范围内土地攫取、土地整合以及农业扩张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跨区域迁移的普遍化,部分食物体制研究者注意到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日益雇工化的发展趋势。部分学者因而批评当前的食物体制分析几乎完全集中于所谓的农民阶层,却忽视了对农业中无产阶级工人的讨论(Otero, 2016; Pye, 2021)。劳动研究因而成为当前食物体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部分学者提出了以劳动为中心的食物体制分析方法,强调廉价农业劳动力是构成所有食物体制的基础。全球工资劳动体系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整合全球农业生产空间的产物(Rioux, 2018: 715)。另外有学者强调,需要在全世界食物体制的运作中关注迅速增长的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可以发展为反抗资本主义食物体制的解放斗争运动的核心力量(Pye, 2021)。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食物体制中的农业工人群体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调查,从而将食物体制理论研究延

伸至性别领域,研究全球农业劳工群体日益“女性化”的趋势及其成因(Garikipati,2009;Diana,2024)。

四、探索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新可能： 食物体制理论的中国意义

(一)潜力与意义:农业社会学视角下的食物体制理论

作为农业社会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世界农业和食物体系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回应,食物体制理论因其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隐匿的复杂权力关系与机制的鞭辟入里的揭示和分析获得了广泛认同。这种揭示和分析一开始是高度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因而在应对当下更为复杂多样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时遭遇了困境。然而这一理论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随着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研究的深入,食物体制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农业体系的运转和变迁不仅发生于宏观政治经济条件所形成的结构之中,而且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之中由不同的“行动者”推动和实施的。这一发现推动了当代食物体制的文化和生态转向,使得食物体制理论吸纳了政治生态学和地理拓扑学的相关概念,形成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多元分析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食物体制研究者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是否存在展开的争论中,食物体制理论展现了其容纳广阔问题域和研究内容的潜力。从最开始关注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到讨论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如何发展演变,再到农民、农业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争论,问题域的不断扩展使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研究不仅在时间、空间尺度上呈现多样化、具体化趋向,也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呈现向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多维度延伸发展的态势。

这些新趋势既有赖于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宏观政治经济架构所撑开的广阔空间,也与食物体制理论所立足和考察的农业的特殊性息息相关。农业是与所有个体、家庭、地区、国家乃至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产业,因而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食物体系的形成、变迁和发展也势必与人类社会的所有要素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强调聚焦于农业的社会方面,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the primacy of the social),即任何特定的经济关系都以一系列社会条件为前提(Newby,1983:74)。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否定食物体制理论对于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结构性层面的分析和讨论,而是认为在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

变迁的宏观叙事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看到体系中的行动主体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一如农业社会学的恰亚诺夫传统和韦伯传统所强调的那样,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在全球的蔓延不仅是资本对农业生产、经营和消费环节的控制与替代,更是资本对身处这一体系中的社会和人的渗透与改造。这一过程既包括物质层面,也会延伸至社会生活乃至价值观念领域。而由不同类型的农业所形塑的差异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也势必会反过来影响渗透进体系的资本。这种双向影响形塑了资本与农业关系的复杂性,因而理应成为食物体制理论未来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基于食物体制理论,讨论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都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角色与影响,考察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形塑了怎样的农业和资本关系,对于食物体制理论自身的发展完善,以及正处于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国际新秩序的中国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切入,结合食物体制理论的最新研究趋势,探讨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农业研究的可能议题及其挑战。

(二) 启发与拓展: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议题

1. 海外农业与国际农业和食物新体系

从重构国际农业和食物体系秩序视角来看,引入食物体制理论对于保障中国海外农业稳定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农食体系中的影响力意义重大。尽管中国主粮自给率一直保持高位,但食物自给率已不足 70% (程国强, 2023)。这意味着中国近三分之一的食物需要通过海外农业资源供给,深入参与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是保障中国食物安全的必然要求。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诸多食物主权的相关问题,学界对此亦有论述(韩一军, 2023)。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在海外进行直接农田投资、开展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和双边农业合作以及收购海外农业企业等方式,以中粮集团和中化集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海外逐渐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中粮集团更是发展成为继美国阿丹米(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之后的全球第五大粮商,资产和业务覆盖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 年该集团总营收 6921 亿人民币,在全球粮商中排名第二。^①

^① 导油网, 2024, 《粮商格局新演变: 2023 年十大国际粮商》, 百度网, 8 月 8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 1806786450712596733&wfr = spider&for = pc>)。

全球食物体制理论研究者都在密切关注迅速崛起的中国海外农业,并对中国将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部分食物体制研究者强调中国海外农业由国家主导的特点,进而将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政策与“新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海外农业的快速崛起反映了国家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影响力在重新增强(McMichael,2020)。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是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进一步商品化和资本化的重要推动力。2023年,中国进口了巴西73%的出口大豆,并以土地收购、资本投资和跨国企业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度参与到巴西的大豆生产经营体系中(Oliveira,2018)。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合作的正常现象,而且中国的海外农业贸易和投资合作显著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部分学者却担忧中国旺盛的粮食进口需求以及不断扩大的海外农业投资会推动受投资国农业的进一步商品化和资本化,导致受投资国土地攫取、环境污染和雨林生态破坏等问题的加剧,进而认为中国海外农业投资与东道国农业经营主体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和张力(Green,2022)。

一方面,这些关于中国的食物体制研究反映了中国海外农业体系建设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深远影响,对于关注中国海外农业超越产业经济范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维度以及认识中国海外农业超越粮食安全和经济效益的多元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揭示了中国海外农业实践和国际形象塑造面临的潜在风险与挑战。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基于二元对立观念对中国海外农业发展的质疑和批判对中国在国际农业和食物领域的国家形象形成了严峻挑战。中国海外农业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要面对来自产业、经济领域的挑战,更需要面对来自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挑战。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中国海外农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土地科学和经济学领域,主要关注海外土地投资和农产品进出口等产业经济议题,鲜少将讨论延伸至食物体制理论关注的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领域(高道明等,2020;于敏等,2023)。因此,无论是推动国内粮食安全和食物体系研究与国际前沿研究接轨、拓宽国内学界粮食安全与主权研究的视角和问题域,还是在构建全球农业和食物新体系的讨论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形塑中国在农业和食物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声誉、推动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都迫切需要引入食物体制理论对中国海外农业和食物体系展开讨论。

2. 小农命运与现代农业转型

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角度切入,将食物体制理论引入中国小农农业命运以

及农业现代化转型道路选择的讨论有重要意义。是否存在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农民群体,以及农民群体能否承担起构建一个替代资本主义食物体系的新食物体系的历史重任,是麦克迈克尔和伯恩斯坦围绕第三个食物体制的核心争论。作为对这场争论的回应,弗里德曼同样将农业摆脱资本主义控制命运的可能寄托于掌握前沿生态科学技术并拥有更大主动权的农民群体 (McMichael, 2021; Friedmann, 2016; Bernstein, 2016)。当代食物体制理论的这场争论揭示出农民群体(小农群体)并不一定是时代的落后残余,工业化、集约化和资本化的资本主义农业体系也不一定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路径。探索一条基于农民家庭农业基础之上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情怀和无奈妥协,还可能成为避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走向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尝试。而这样一条道路的探索对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转型尤为重要。

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平均 80% 的城镇化率和 3% 的农业从业人口占比,^① 2023 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66.16%,其中还包含近 3 亿拥有农村户籍而工作生活在城镇的流动农民工群体。^②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仍存在 69 万个行政村和近 1.8 亿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从业人口的 24%),这些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家庭经营的小农户。^③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则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区别于西方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这使得通过国家的引导和支持,在保留小农农业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成为可能。已有不少农业社会学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接续农业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部分学者关注小农群体的分化与资本主义对小农的剥削控制,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村集体的组织作用,以组织化的小农群体为基础推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严海蓉、陈义媛, 2015; 陈义媛, 2024)。而沿着农业社会学恰亚诺夫理论传统的脉络,一些学者关注小农家庭农业“差异化最优”和“韧性”等特点,强调小农家庭农业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突出优势,主张以小农家庭农业为基础实施“纵向一体化”来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陈军亚, 2019; 黄宗智, 2024)。基于农

① 数据来源: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世界银行网站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检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29 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③ 《2023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https://www.mohrss.gov.cn/xgk2020/fdzdgknr/ghtj/tj/ndtj/202406/t20240617_520366.html)。

业社会学的韦伯传统,部分农业社会学者则强调小农群体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担纲者群体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从行动伦理视角切入,尝试以韦伯的理性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这一群体的行动伦理(桑坤、李琳,2021;熊春文、陈家碧,2023)。这些研究都为探索一条建立在小农家庭农业基础之上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能够被纳入食物体制理论对未来农业和食物体系以及农业命运的讨论中。

值得欣喜的是,已有中国学者尝试将中国小农群体的特殊行动伦理与食物体制理论结合进行新的讨论(Fang et al.,2024)。将食物体制理论引入中国小农农业命运以及农业现代化转型道路选择的讨论,不仅对拓展中国小农命运与农业现代化转型道路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也能为食物体制理论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农业和食物体系发展新道路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

3. 食物体系与粮食安全

从食物体系治理角度切入,食物体制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国内部粮食体系的隐匿机制和潜在风险。食物体制理论揭示了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在生态与社会层面的突出问题,即随着生产端和消费端物理距离的不断拉长,食物体系“生态反馈”机制的削弱会导致整个体系生态风险的不断累积。而日益复杂的生产消费链则使得资本可以在不参与生产的情况下通过掌握关键环节(流通、销售环节)和关键技术(化学、生物、信息技术)实现对整个体系的控制。这对于中国内部粮食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启发意义。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始终坚持主粮自给原则,三大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①这意味着中国内部维系着一个满足近14亿人口主粮需求的庞大粮食体系。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几乎等同于欧洲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内部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却日趋“两极化”。2023年,13个粮食主产区生产了全国77.9%的粮食。^②过度集中的粮食生产导致主产区自然资源消耗较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地区生态环境承受力遭遇挑战。而牵涉多环节、多主体的现代粮食流通体系则使得粮食生产者难以获得足够的生态反馈,产量和效益成为其唯一的生产导向,农药激素滥用等现象屡禁不止。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物理距离不断拉长使得生态风险不断累

① 《国家行动方案背后:三大主粮自给率95%,一年浪费食物4.6亿吨》,2024,《财经杂志》,11月27日(https://h5.ifeng.com/c/vivo/v002SrwUsKFHTM52SUrVfzyJFcLrZQn7Afqa5CTtD_Sg9GrU__)。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检索时间:2024年10月29日。

积,对中国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造成威胁。

从社会层面切入,为了保障主粮绝对安全,中国禁止外资进入主粮购销领域,这使得中国内部的粮食体系避免了被跨国资本渗透和控制。然而,中国内部不同区域围绕粮食生产消费的权力和利益不均等问题却日益突出。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求,粮食主产区不得不持续扩大粮食生产。这不仅限制了主产区兼业农业和多功能农业发展的可能,更制约了地区产业经济转型。推动粮食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和资本化,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条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已成为主产区的唯一选择。然而日益资本化的粮食农业并未能给主产区农民和政府真正带来收益,反而为主销区资本跨区域控制和占取粮食产业利润提供了便利。2022年,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吉林省粮食总产量816.16亿斤,粮食加工业总产值为870亿元;作为对比,粮食自给率不足30%的浙江省2022年粮食产量仅为124.2亿斤,粮食加工产业总产值却达到了752.8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2)。在这背后,是拥有更多资金、更高技术和更靠近消费市场的主销区资本对粮食产业高附加值环节和关键技术的掌控。粮食主产区“粮食越多,财政越穷,经济越差”现象的背后不仅是粮食产业本身的局限,还隐藏着产销区粮食体系的内在机制。国内学界并非没有注意到现行粮食体系存在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也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分析(戴化勇、陈金波,2021;杜蓉等,2023),然而这些研究局限于技术和经济视角,难以揭示隐匿于粮食体系背后的权力和利益不平等关系。因此,中国粮食—食物体系治理研究迫切需要引入食物体制理论,厘清当下中国内部粮食体系隐匿的内在机制,为防范化解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系统性风险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路径。

(三) 束缚与局限:将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挑战

尽管将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有着极强的適切性和必要性,但我们仍须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西方学界提出的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理论,食物体制研究深受西方学界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黄宗智,2019,2020)。这种影响导致的范式惯性使得西方食物体制研究者在宏观分析中将由国家引导的中国农业对外合作与“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等概念联系在一起(McMichael,2020;Mora,2022),并将中国海外农业投资视作对受投资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国家自主发展的影响与干预(Akram-Lodhi,2012)。而在微观分析中,相关研究又过分强调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认为中国海外农业投资和贸易合作尽管显著提高了受投资国家的

基础设施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但合作成果却未能真正为受投资国的农业经营主体所共享(McMichael,2020)。

然而,中国践行的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发展道路。中国相信并支持互惠互利的国际自由市场与贸易合作体系,但绝不相信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和只存在于理论假设中的“无为国家”。中国积极介入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但并不追求成为支配他国的“霸道”国家,而是志在推动合作共赢的“王道”国家(黄宗智,2020)。正是在这样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的海外投资实践呈现出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方式、尊重受投资国政策和发展需要的长期合作模式(Lee,2017)。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道路也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二元合一的(黄宗智,2019)。国家对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深度介入不是对农业经营主体利益的侵害和剥夺,而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统筹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尤其是小农户利益)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道路与模式。

因此,将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不仅是基于食物体制理论对现代农业和食物体系深刻独到的分析启发及拓展中国农业和食物研究的过程,而且是借助中国经验和理念去克服二元对立范式惯性对于食物体制理论的束缚、探索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发展新可能的尝试。

五、结论与讨论

围绕“体系”和“规则”两个核心概念,食物体制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稳定—变迁分析框架,使隐匿于世界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得以具象化。这一理论将全球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极具解释力地阐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借助农业和食物体系来形塑整个世界的。进入新时期,虽然这一理论流派对当前食物体制的讨论存在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这个理论框架不是线性的、单向度的,而是拥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当代食物体制理论对于生态和文化领域研究的拓展及其在研究尺度、方法和内容上的更新使得这一理论有望突破既有局限、延伸解释链条、保持鲜活生命力,成为农业和食物领域跨学科、跨区域和跨文明融合研究的重要媒介理论。

对于中国农业研究而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建立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食物体制理论与农业社会学诸多理论传统的结合能够为在农业领域完善中国体制机制的探索提供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从推动国际农业和食物新体系的视角切入,食物体制理论对于保障中国海外农业稳定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完善中国农业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意义重大。从农业现代转型角度切入,食物体制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小农农业的重要作用、探索“大国小农”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完善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从食物体系治理角度出发,食物体制理论则能为厘清中国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内部机制和潜在风险、防范化解粮食体系系统性的生态风险、深化农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参考。尽管当前食物体制研究仍存在由范式惯性所导致的局限和偏见,但这些局限和偏见也证明了中国学者参与食物体制讨论、在国际农业和食物研究领域发出中国声音的必要性。当下,无论是从保障中国自身食物主权和安全出发,还是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农业和食物新秩序,这一理论工具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这一理论视角,当前中国农业转型中的诸如“海外农业”“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道路”“小农命运”等重要议题都可以重新被讨论并形成新的理解。

对于中国农业社会学而言,食物体制理论传统的形成及其在当代的演进构成了一种佐证和方向。它佐证了农业社会学既具备区别于农业自然科学、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独特视角与关怀,又拥有包容吸纳不同学科智识成果、形成跨学科领域共识的能力与潜质。而当代食物体制理论在演进中形成的覆盖生产—消费全部环节、统筹时间—空间分析维度以及兼具宏观—微观分析视角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则为中国农业社会学者围绕当前中国农业领域最重要的、最前沿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开展相应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将食物体制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探索既是对国际农业和食物研究最新动向和讨论的积极呼应,亦是发展扎根本土的中国农业社会学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 班固,2005,《汉书》第一卷,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
- 陈军亚,2019,《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陈义媛,2024,《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的组织化:不同服务模式的比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程国强,2023,《大食物观:结构变化、政策涵义与实践逻辑》,《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 戴化勇、陈金波,2021,《新形势下粮食产销协作模式与机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杜蓉、柳思维、蔡荣,2023,《中国粮食空间生产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经济问题》第8期。
- 方平、李彦岩、周立,2023,《国际视野和权利视角下的大食物观》,《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 高道明、田志宏、黄德海,2020,《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2,《2022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年鉴》,北京:人民出版社。
- 韩一军,2023,《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问题与对策》,《人民论坛》第4期。
- 黄宗智,2019,《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第11期。
- ,2020,《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学术月刊》第7期。
- ,2024,《“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理论对中国的意义》,《开放时代》第1期。
- 李静松,2019,《社会学视域中的农业与食物研究:一个分支学科的形成及其问题意识的演进》,《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 ,2020,《超越生产主义——探析全球农业食物体系转型进程中的锁定效应》,《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李其庆,2004,《法国调节学派评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 桑坤、李琳,2021,《农业资本化中的阶级分化、理性类型与农民的出路——评帕特里克·穆尼 My Own Boss?》,《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熊春文、陈家碧,2023,《青年农民返乡村居的生计体系及其社会基础——基于对华北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青年研究》第1期。
- 许准,2024,《国际粮食体系的危机与重建》,《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
-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第5期。
- 于敏、李傲、茹蕾,2023,《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基本特征、问题与建议》,《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7期。
-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2013,《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芳、夏继国、顾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立、罗建章、方平,2022,《21世纪中国的食品安全与食物主权》,《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kram-Lodhi, A. Haroon 2012, “Contextualising Land Grabbing: Contemporary Land Deals, the Global Subsistence Crisis and the World Food System.”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2).
- Amin, Samir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Vol. 1). Trans.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 Araghi, Farshad 2003, “Food Regim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Value: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0(2).
- Bernstein, Henry 2016,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World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Food Regime Analysi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3).
- Brown, Trent 2020, “When Food Regimes Become Hegemonic: Agrarian India Through a Gramscian Len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1).
- Buttel, Fredrick 2001, “Some Reflections on Late-twentieth Century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Sociologia Ruralis* 41(2).

- Camba, Alvin A. 2018, "The Food Regime in Late Colonial Philippines: Pathways of Appropriation and Unpaid Work."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9(1).
- Campbell, Hugh 2009, "Breaking New Ground in Food Regime Theory: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Ecological Feedbacks and the 'Food from Somewhere' Regime?" *Agriculture and Human* 26.
- Diana, Mincyte 2024, "Rethinking Food Regime as Gender Regime: Agrarian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 51(1).
- Dixon, Marion 2014, "The Land Grab, Finance Capital, and Food Regime Restructuring: The Case of Egypt."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41(140).
- Escher, Fabiano 2021, "BRIC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Food Regime Reordering: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1(1).
- Fang, Ping, Hui Ma, Yunxiao Xi & Li Zhou 2024, "'Insiders Eating Home-grown Food', Home Gardens of Chinese Smallholders, and Hidden Resistance in the Food Regime Transi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51(1).
- Friedmann, Harriet 1995,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5(3).
- 2005, "From Colonialism to Green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s and Emergence of Food Regime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Global Development* 11.
- 2016, "Commentary: Food Regime Analysis and Agrarian Questions: Widening the Conversa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3).
- Friedmann, Harriet & Philip McMichael 1989,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Agricultures, 1870 to the Present." *Sociologia Ruralis* 29(2).
- Garikipati, Supriya 2009, "Landless but Not Assetless: Female Agricultural Labour on the Road to Better Status,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3).
- Goodman, David & Michael Watts 1994, "Reconfiguring the Rural or Forging the Divide?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and the Global Agro-food System."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2(1).
- Green, Nathan W. 2022, "Placing Cambodia's Agrarian Transition in an Emerging Chinese Food Regim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9(6).
- Lee, Ching Kwan 2017,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kobsen, Jostein 2021, "New Food Regime Geographies: Scale, State, Labor." *World Development* 145.
- Marsden, Terry 2016, "Exploring the Rural Eco-Economy: Beyond Neoliberalism." *Sociologia Ruralis* 56(4).
- McMichael, Philip 2009, "A Food Regime Genealo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
- 2014, "Historicizing Food Sovereignt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6).
- 2020, "Does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Prefigure a New Food Regim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7(1).
- 2021, *Food Regimes and Agrarian Questions*. Rugby: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 Mora, Sol 2022, "Land Grabbing, Power Configurations and Trajectories of China's Investments in Argentina." *Globalizations* 19(5).

- Newby, Howard 1983, "European Social Theor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owards a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 Oliveira, Gustavo de L. T. 2018, "Chinese Land Grabs in Brazil? Sinophobia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in Brazilian Soybean Agribusiness." *Globalizations* 15(1).
- Otero, Gerardo 2016, "Review of Philip McMichael's Food Regimes and Agrarian Question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22(1).
- Otero, Gerardo, Pechlaner Gabriela & Gürcan Efe Can 201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ecurity and Trade: Uneven and Combined Dependency." *Rural Sociology* 78(3).
- Pechlaner, Gabriela & Gerardo Otero 2008, "The Third Food Regime: Neoliberal Globalism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 North America." *Sociologia Ruralis* 48(4).
- Pietilainen, Emma Pauliina & Gerardo Otero 2019, "Power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Neoliberal Food Regime: Oil Palm Expansion in Guatemal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6(6).
- Plank, Christina, Robert Hafner & Rike Stotten 2020, "Analyzing Values-based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the Austrian Third Food Regime." *Österreich Z Soziol* 45.
- Pye, Oliver 2021, "Agrarian Marxism and the Proletariat: A Palm Oil Manifesto."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8(4).
- Ríos-Núñez, Sandra M. & Daniel Coq-Huelva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nish Livestock System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Food Regime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4).
- Rioux, Sébastien 2018, "Rethinking Food Regi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Temporal, Spatial and Scalar Dimensions of the First Food Regim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4).
- Torrado, Marla 2016, "Food Regime Analysis in a Post-neoliberal Era: Argentina and the Expansion of Transgenic Soybean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6(4).
- Whatmore, Sarah 1995, "From Farming to Agribusiness: The Global Agro-food Chain." In Robert J. Johnson, Peter J. Taylor & Michael J. Watts (eds.),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Remapping the Worl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Wang, Kuan-Chi 2018, "East Asian Food Regimes: Agrarian Warriors, Edamame Beans and Spatial Topologies of Food Regimes in 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4).
- Werner, Marion 2021, "Placing the State in the Contemporary Food Regime: Uneven Regulatory Development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8(1).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熊春文、柯雪龙)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梦琪)

责任编辑: 刘 齐